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朝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思想、文化、人物](#) / [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北京节令风俗考略](#)

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北京节令风俗考略

2006-12-16 王岗 中华文史网 点击: 456

[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北京节令风俗考略](#)

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北京节令风俗考略

王岗

中华文史网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从元代开始的。正是这种政治、文化地位的变化，使得在这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多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倍受人们的关注，风俗的变化也是如此。在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风俗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表现出了北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融合的风貌，而到了元代，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使得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农耕文化逐渐北上，并且在京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受其影响，都城的风俗也开始从地域支流文化向京师主流文化转变。

古人对社会风俗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视的，将其视为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蹇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¹⁾但是，中国学者将社会风俗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迄今为止，对北京风俗加以研究方面的专著尚未见到，有关论文也不多见，故而笔者撰写此文，力求对元明清三代北京的风俗概貌加以梳理及考订。

一、宫词与竹枝词的源起及与风俗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诗的传统民族，早在先秦时期，著名儒学大师孔子就曾将散见在各诸侯国中的诗章加以整理，并得以流传后世，成为儒家学说中的一部重要经典《诗经》（又被称为“诗三百篇”）。在《诗经》一书中，有许多诗篇生动地反映出先秦时期人们的风俗习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云：“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肆於司乐，篇什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²⁾在诗三百篇中，既有以描写宫廷生活为主的《周颂·清庙》、《鲁颂·閟宫》诸篇章，也有以描写百姓生活为主的《周南·关雎》、《郑风·女曰鸡鸣》等篇章。

在这些诗篇中，反映了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风俗状况。当时的统治者周天子为了能够了解民俗，治理天下，要定期到各诸侯国去采访，史称“巡狩”，“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³⁾当时周天子巡狩四方，命太师所陈述的“以观民俗”的诗篇多达几千首，而今日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经过孔子整理的三百余篇了。这些诗篇，既是中国诗歌创作的最早的典范，也是反映当时社会风俗状况的最珍贵的历史资料。所以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才有“《六经》皆史”的论断，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到了唐代，中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巅峰，几乎所有的诗歌体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且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代表作。其中，《宫词》与《竹枝词》则是两个具有较为独特风格的诗词体裁。《宫词》，顾名思义，乃是以反映宫廷生活为主题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诗歌。但是，在中国古代，宫廷生活是秘而不宣、寻常百姓十分有兴趣却又无法得知的事情。而那些熟知宫廷生活的帝王后妃、太监宫女们，又很少有能够提笔作诗的文学修养，故而，《宫词》的创作有着较大的难度。此外，当时人们对《宫词》还普遍存在着两种成见或是顾忌，也对《宫词》的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其一，是认为《宫词》不登大雅之堂。例如唐代初年，“太宗作《宫词》，使虞世南和之，而虞尚以体非雅正，不奉诏。”（4）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其所作《宫词》，都会被大臣视为“体非雅正”，那么，普通诗人的诗歌作品就更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其二，是因为《宫词》所述皆为宫廷生活，极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引来不测之祸。唐代著名诗人王建，就曾因为所作《宫词》“天下皆诵于口”，而几乎遭到弹劾，引来祸患。（5）而另一位著名诗人元稹所作《宫词》，“诏令隐其文”。

《竹枝词》与《宫词》不同，系源自民间，《竹枝词》本夜郎之音，起于刘朗州，盖《子夜歌》之变也，实有风人骚子之遗意。故杨廉夫云：“制竹枝词者，不犹愈于今之乐府乎？”（6）到了唐代，《竹枝词》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文娱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因为这时的《竹枝词》还没有脱离诗文与音乐的联系，《竹枝词》在创作成诗文之后，即可被人们传唱，特别是各地的儿童，更是在每年的节庆期间加以联唱，并配以舞蹈，十分热闹，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7）刘禹锡到建平（在巴东）时是在正月节中，遇到儿童们载歌载舞《竹枝词》颇受感动，遂乘兴命笔，创作了9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在当时的京城长安，《竹枝词》也很流行，“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8）不仅教坊司的儿童们会唱《竹枝词》，就连寺庙中讲禅论法，也唱《竹枝词》。

与《竹枝词》相似的，又有《杨柳枝》、《杨枝词》等，在民间流传亦极为广泛。如《杨柳枝》词，时人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9）不仅诗人颇好此词曲，就连帝王、武将也以此相互赠送。唐代末年，“（朱）全忠归大梁，上（指唐昭宗）宴之内殿，置酒于延喜门。……上临轩泣别，又令中使走送御制《杨柳枝》词五首赐之。”（10）唐代以后，《竹枝词》得以流传后世，而《杨柳枝》、《杨枝词》等却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古人对社会风俗的作用虽然十分重视，但是，在历代修撰的正史中，却很少有专门记载风俗概况及其变迁的篇章。史官们不再到民间采风（11），他们关注的，只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后妃节妇的“嘉言懿行”，而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很少加以表述。因此，后人要想了解一些前人的风俗状况，就必须别辟蹊径，除了历代野史、文人笔记、郡县方志之外，在文人日常最喜爱的诗歌创作中，特别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宫词》、《竹枝词》等创作中，我们可以得到当时人们在生活中所表露出来的真实信息。

显然，《宫词》与《竹枝词》相比，二者所反映的生活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宫词》所反映的主要是宫廷贵族生活，而《竹枝词》所反映的，则主要是大众的平民生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若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出发，二者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过春节，富人要贴春联，吃饺子，穷人也是如此；重阳节，帝王要登万岁山，穷人也要登小土丘。二者内容差别虽然很大，形式却是一样的，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

我们如果要全面的、客观的认识一个时代的风俗概貌，只了解贵族生活，或是只了解平民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古语所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此，笔者将《宫词》与《竹枝词》中有关当时社会风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以便考订源流，并力求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二、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的岁时节令风俗：

在中国古代的风俗中，节令风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岁时节令、宗教节令和帝王、后妃生辰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岁时节令的产生，主要是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充分显示出农耕文化在人们的风俗中占有主

导地位。宗教节令的产生，主要是与不同宗教派别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的，人们对宗教节令的关注程度，与其宗教信仰的程度是一致的，越是热闹的宗教节令，表明其在社会民众中的宗教影响越广泛。帝王生辰与岁时节令、宗教节令的不同之处，一是其时间上的不固定性，每个帝王的生日是不同的；二是其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色彩。

在岁时节令中，最重要的当属元日，又被称为正旦或是元旦，今天则被称为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一年之始，一季之始，一月之始，故而又被称为“三元”或是“三朔”（12）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正朔也不同，至迟到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举行盛大活动，以庆祝元旦，通称之为大朝会。“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13）在这个大朝会上，百官又曾相互比试学问高低，“（光武帝时）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14）

到了元明清时期，这种大朝会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在元代，诗人张昱曾作诗四首，以形容大朝会的壮观场面：“方朝犹是未明天，玉戚轮竿已俨然。百兽蹲威绘檐下，万臣効职内门前。”又一首曰：“二九行分正从班，尽将牙笏注名单。簪铺兽镇丹墀内，鹄立千官绕画阑。”（15）为了增添大朝会的节日气氛，元朝帝王还专门赐给近侍大臣华美的绸缎，称为“拜年段子”（16）。大朝会之后，帝王设大宴会与百官同庆，“黄金酒海赢千石，龙杓梯声给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乐太平年。”（17）

在明代，元日的大朝会也很壮观，“楼阁崔嵬起碧霄，微闻仙乐奏箫韶。天风吹落宫人耳，知是彤庭正早朝。”（18）自明成祖任用宦官，使其地位不断提高，权势日增，逐渐凌驾于百官之上。这种状况，在大朝会时也有所反映，时人作诗云：“簪纓前列九梁随，为届三元庆贺期。金带当阶高赞导，外廷仪注拜丹墀。”（19）在中国古代，只有帝王才能够顶戴九梁之冠，而明朝宦官竟然敢在大朝会上戴，其气焰之嚣张，于此可见一斑。

在明代，大朝会之后，帝王也要摆筵席，赐百官赴宴。但是，与元朝相比，其规模要逊色得多。时人作诗述洪武年间大朝会后赐宴之情景曰：“君王蚤起视千官，金灶争催具凤餐。红粉珠盘排欲进，再三擎向手中看。”（20）及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大朝会赐宴越来越简略。“（永乐）十九年，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大宴。宣德、正统间，朝官不与者，给赐节钱。凡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午、重阳、腊八日，永乐间，俱于奉天门赐百官宴，用乐。其后皆宴于午门外，不用乐。”（21）

在明代的元日大朝会上，有时也会出现意外事件，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元旦，“群臣待漏入贺，日晡礼始成。及散朝，已昏夜。众奔趋而出，颠仆相践踏。将军赵朗者，死于禁门。”（22）又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元旦大朝会，时观吏与试士俱集大廷，忽众中有人持大铁椎，狙击御史凌汉翀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绝。举朝大惊，急擒下，则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应登也。御史为从者舁至寓，复著，用良药敷治，仅得不死。”（23）

在明代，宗教活动也开始融入元日的庆典之中。宫人（太监及宫女）在这一天于皇城内英华殿大行佛法。“此日英华法事停，鸣锣捧杵尽倾城。弓鞋不便连环变，繖底拈花自在行。”（24）道士也在这一天进上道符，遍贴宫中各宫门之上。“葵榴初纈药阑敷，彩线珍成续命需。遥听三韩烽火急，真人刚进避兵符。”（25）在宫门之上贴道符，与人们贴春联的用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避邪驱灾。

元日贴春联的风俗起源很早，源自门户挂桃符。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云：“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庭前爆竹，进椒柏酒，服桃汤，进数于散，造五辛盘，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26）文中所云“桃板”，也就是桃符。“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此仙木也。”（27）一直到唐宋时期，人们还把门上贴的春联称为“桃符”。

在北宋都城汴京，“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28）文中所云“桃板”、“桃符”，就是今天的春联。到了清代，贴春联的风俗仍然盛行，时人作《竹枝词》曰：“挂门钱纸飏春风，福字、门神处处同。香墨春联都代写，依然十里杏花红。”（29）显然，古人桃符的功能已经被一分为二，除了春联之外，又多了门神。

此外，清代的风俗又有所变更，时人又作诗曰：“柏叶芝麻烧夜香，葫芦贴罢供

阡张。乌金纸剪飞蝴蝶，嚷嚷婴孩插闹粧。”（30）其诗注曰：“元旦作葫芦、人物、花卉杂贴门户，镂白纸供祖先，号‘阡张’。小儿头插闹粧，亦曰‘闹嚷嚷’。”由此可见，在清代的北京，人们过年除了贴春联、门神之外，还贴有人物、花卉等年画，已经完全失去了“桃符”的本意，只是为了使节日的气氛更加热闹。

到了嘉庆年间，“康乾盛世”已过，封建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京城的感觉是很灵敏的，就连过年贴春联的喜庆气氛也明显减少，时人又作《竹枝词》曰：“国恩家庆写春联，纶綉醍醐几万千。近日这般的渐少，干支冠首换年年。”（31）年年过节，年年贴春联，却没有了喜庆的激情，而是无奈的应酬。这种感触，在道光年间的诗人笔下仍是如此：“市廛春对作来工，号记编头到处同。未解摘词徵本色，聊将字样写兴隆。”（32）

距元日最近的重要节日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或是灯节。因为据道教的说法，“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33）而元宵节燃灯庆贺，又是佛教的因缘。据明朝人考订，其风俗始于唐代，“《唐书·严挺之传》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请然千灯，因弛门禁，帝御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继而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看灯。’则是始于睿宗，成于玄宗无疑。……”（34）

到了宋、金时期，上元日闹花灯的娱乐活动盛极一时。在宋朝都城，“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35）其盛况甚至超过了元日。

在元代前期，蒙古统治者及其大臣们对元宵闹花灯的风俗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元英宗时，“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张养浩）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36）到了泰定年间，元朝帝王“敕以来年元夕构灯山于内廷，御史赵师鲁以水旱请罢其事，从之。”（37）先是元世祖严禁元宵节民间闹花灯，后是元英宗及泰定帝想闹花灯，又受到大臣们的劝阻。

而到了明代，元宵节闹花灯的风俗才再度盛行。时人作《宫词》以描述其盛况云：“鳌山烟火冠春城，步攀龙旌倒褪行。忽报大官供法酒，玉音宣唤五先生。”

（38）是时，宫廷中的花灯之盛，又非民间所能比拟，“鳌山灯火出墀隅，蓬勃千枝万蘂萼。跪地金钱输喝采，长明塔峙络珍珠。”（39）唐代灯节放三日假，宋代灯节放五日假，而到了明代则延长为十日假，甚至二十日假。

在明代，北京城里的民间灯市主要设在东华门外，起于正月初八，迄于正月十七，白天为商市，晚上为灯会，虽然花灯的质量无法与宫廷相比，其热闹的程度却绝不逊色。白天商市，“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闾城溢郭，旁流百廛也。”晚上灯会，“丝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妍媸。”（40）不仅燃花灯，而且还有各种精彩的演出，灯火与乐舞交相辉映，把节日气氛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清代，元宵闹花灯的风俗仍很盛行，“火树银花绕禁城，太平锣鼓九衢行。今年又许开灯戏，贵戚传柑到四更。”（41）显然，灯节是否兴盛，是与封建统治者的是否提倡密切相关的。“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42）由此可见，在清代初年，三元节日皆举办灯会，此后只有上元节才闹花灯，恢复了明代的习俗。

端午节是夏季最重要的节令。人们的活动也是十分丰富的。封建统治者在这一天往往要宴请贵戚及百官，“玉腕调冰涌雪花，金丝缠扇绣红纱。彩牋御制题端午，勅送皇姑公主家。”（43）明代的端午节赐食虽然较为简略，其费用也颇为可观

（44）。端午节已到夏季，天气转热，于是有了赐冰碗及宫扇的活动（45）。而且由皇帝赐给贵族和官僚们的宫扇数量多、制做精，堪称一时的艺术精品。当时人曾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描写（46）。

这种端午节赐扇的风俗，在辽金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尚未见到，但是，在唐宋时期却是常见的。如在唐代，“贞观十八年五日（端午日），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虬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47）北宋时期，宋仁宗

在嘉祐年间亦曾赐给讲读官御书飞白扇。

到了南宋初期，宋、金双方时有使臣往来，宋朝统治者还曾在端午节向金朝使臣赐扇，绍兴十五年（1145年），“（金使臣）宗永甫入疆，帝以端午，遣中使赐扇帕于洪泽，宗永言：‘上国是日例贺，当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48）金朝使臣对宋高宗端午赐扇的活动是十分重视的，态度也是很谨慎的。

端午赐扇的风俗如果再往前延伸，可以上延到南朝刘宋的升明元年（477年），“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49）宋顺帝刘准因为皇太后的赐扇不够精致，竟然想要鸩杀太后，幸而被手下大臣劝阻，是时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可惜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端午赐扇的风俗已经日渐消亡了。

在端午节，更为广泛的节令活动是射柳、泛舟。射柳活动，在辽、金、元三代十分普遍，不仅是在端午节，就是在其他的节令，也是较为重要的活动，这是与辽金元时期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领袖密切相关的。但是，到了明代，这种风俗仍然得到传承，“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躡柳拜前旒。八铢穿得都班赏，夺取头标胜一筹。”（50）这种场面壮观的“射柳”活动，只有宫廷中的封建统治者才有能力举办，民间的百姓是只能观看，而且要得到统治者的特许。

有些研究辽金史的学者认为，端午节射柳的活动是北方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风俗，其实不然，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在唐代中期，“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篮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膩而难食也。都中盛于此戏。”（51）我们如果说这种“射粉团”的活动乃是“射柳”活动的滥觞，从习俗传承的角度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射柳活动相比，泛舟活动显然具有更多南方文化的特色，所谓北人擅骑射，南人擅舟楫。因此，在辽金元时期的北京，端午赛龙舟的活动很少见，而到了明代又流行起来，“招招黄帽绣旗冲，三翼乘流羯鼓从。何用船头鳞鬣活，中央万乘是真龙。”（52）当然，由于北方自然环境的条件所限，端午赛龙舟的活动很难在民间普遍开展。

民间百姓虽然不能参与射柳活动，却也有自己的活动方式，“‘咬春’过了又‘填仓’，到得‘熏虫’柏子香。插柳天坛逢午节，耍青同上打毬场。”（53）“耍青”又称“踏青”，是春季到夏季的民众主要活动，其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京郊的宽敞草地，如诗中提到的天坛及东郊二闸、西南郊丰台、西北郊高粱河畔等地。明清时人对此有较多描述（54）。

至于秋季最重要的节令重阳节和冬季最重要的节令冬至节，其登高、颁历书等风俗活动，其形式南北各地大致相同，而今天也已经不多见了，本文不拟赘述。就节令风俗而言，每年的春天最多，以后依次递减，冬天最少。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农耕文化的主流特征相一致的。从元代到清代，虽然社会发展变化较大，却仍然处于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故而风俗习惯一脉相承。

三、元明清三代北京岁时节令风俗变迁述略：

元朝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虽然表现出了许多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特色，但是无法改变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主流作用，因此在元日、元宵、端午、重阳、冬至等重要的时令节日中，也就自然而然的承袭了前代王朝的许多活动模式。而在这些活动模式的表面现象之后，却反映出了农耕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理念。

古人对元日的重视，主要因为从这一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就是一年。同时，人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周期，而这个周期就是一岁。农业生产的周期显然要比工业生产周期慢得多，也固定得多，故而从春天到秋天，每个时令节日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农历的正月是一年之始，而又没有正式投入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因此节令活动就特别多，人们也有空暇从事休闲娱乐活动，节日的喜庆气氛格外浓郁。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节令中，许多节日活动的道具与农业生产的环境是一致的。如春节人们要在门首挂上桃符，在农村的庭院中，人们往往会栽种桃树，桃枝随手可得，到了今天的现代化城市中，到处都是洋灰楼、柏油路，桃树几乎绝迹，人们也就很难在门首悬挂桃符了。端午节的射柳活动不仅绝迹了，就连射柳用的弓箭现在

也很少有人会制作了。到了重阳节，人们更是很少再泡菊花酒喝了。

随着现代大工业取代农业而成为整个国家的支柱产业，文化的主流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风俗习惯也由此而发生了变化，有些习俗消失了，有些习俗产生了，但是，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因此断裂，而是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仍然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春节仍然是广大中华民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平时吃饺子已经很容易了，过年人们仍然会合家团聚，包饺子吃。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活动都无法取代的。

(1) 《盐铁论》卷十《大论第五十九》。

(2) 《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诗赋叙录》。

(3) 见《尚书大传》卷一《尧典》所引《白虎通·巡狩篇》。

(4)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三《诗文类》。

(5) 据《云溪友议》云：“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八《文章一·王建》所引之文。

(6) 《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辩证类·西湖竹枝词》。

(7) 见《全唐五代词》卷一《唐词》所引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前序。

(8) 《全唐诗》卷三百七十四，孟郊《教坊歌儿》。

(9) 见《全唐五代词》卷一《唐词》所引薛能《杨柳枝词18首》前序。

(10) 《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 必

(11) 所谓“采风”，就是帝王派遣政府官员到全国各地收集诗歌、民谣，以了解民间的风俗。

(12) 据《初学记》所引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玉烛宝典》曰：正月为端月。（《春秋》曰：履端于始。）其一日为元日，（元者，善之长也，先王体元以居正。又，元者，原也，始也，一也，首也。）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亦云三朔。”此外，古代天文学家和道教学说中，皆有“三元”之说，与此概念完全不同。

(13) 《晋书》卷二十一《礼志》。

(14) 《后汉书》卷七十九《戴凭传》。

(15) 见《张光弼诗集》卷二《鞞下曲》之四、之七。

(16) 元人柯九思曾所作《宫词》，其词曰：“传宣太府颁宫锦，近侍承恩拜榻前。制得袍成天未晚，着来香殿贺新年。”其词注曰：“腊前分赐近臣襖材，谓之拜年段子。”见《草堂雅集》卷一。

(17) 见《张光弼诗集》卷二《鞞下曲》之十六。

(18) 明人朱权所作《宫词七十首》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笔者注：此诗作于永乐六年（1408年），时明成祖尚未迁都北京，朱权所述，当为洪武、建文及永乐初年之事。然大朝会典制已成模式，迁都前后，大致相同，故引用之。

(19) 明人秦徵兰所作《天启宫词一百首》之二十八。（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内臣朝冠与外廷同，七梁或五梁。……魏忠贤更益二梁为九梁。良卿锡券后，凡遇贺节，王体乾以下服九梁，忠贤俨然戴簪纓，出班行礼。”

(20) 明人黄省曾所作《洪武宫词十二首》之六。（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

(21) 《明史》卷五十三《礼志·大宴仪》。永乐年间赐宴奉天门，系因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发生大火，皇宫正殿奉天殿被焚毁，不得不设宴于奉天门。

(22) 《明史》卷二百〇六《程启充传》。

(23)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乙卯应天闹中之异》。

(24) 明人秦徵兰所作《天启宫词一百首》之三十九。（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番经厂内官百人，习西方梵呗。遇万寿、元旦等

节，于英华殿作法事。卒事之日，一人粧韦驮，捧杵北面立。余披瓔珞，鸣锣钹海螺诸器，赞唱经咒。至夜，五方设佛位，立五色繖。数十人鱼贯而行其间。所谓‘九连环’者，其行颇疾，至九连环变，则体迅飞鸟，观者目眩矣。”

(25) 明人蒋之翘《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之七十一。（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每岁元旦、端午，真人府进符篆，贴各宫门上。”

(26) 见《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元日第一》。

(27) 见《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桃第三》所引《典术》之文。

(28) 见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

(29) 见清人净香居主人所作《都门竹枝词》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30) 见清代佚名所作《燕台口号一百首》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31) 见清代佚名所作《都门竹枝词·时尚》之三。（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